

从世界历史全局看西属拉美 独立运动的性质和特点

郑 昌 发

近年来,随着拉丁美洲史研究的深入,我国一些学者对19世纪初拉美独立运动的性质问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①。为了从总体上加深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本文试从世界历史全局的角度,从剖析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历史地位和作用等方面的问题,探讨拉美独立运动的性质和特点,以就教于读者。

一

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类历史已经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的日益高涨的时代,资产阶级革命、民族独立运动业已超越个别国家、局部地区的狭小天地,遍及于全球大部分地区。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来看,如果将16世纪尼德兰革命和17世纪英国革命视为首次高涨的话,那么,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至19世纪初,它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如果以北美独立战争作为这一新高潮的起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将它推向了高峰,那么,西属拉美独立运动(以及海地革命和巴西独立运动)就是这个高潮的扩展、延伸和继续,使之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影响更深。因此,从世界历史全局的角度俯览,可以说西属拉美独立运动是这一时期世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观点并非人们的主观臆断,而是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造成,并为实践所证实。

西班牙美洲独立革命之所以从1810年在西属美洲各总督区同时发动和普遍展开,根本原因虽然是西班牙殖民主义者长期对该地区人民的残酷压迫与剥削,以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民族意识的增强使民族矛盾空前激化所致。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因素。因为这场革命爆发的时机、进程和结局都无不打上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烙印,无不受到当时的革命思潮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影响。

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的300年间,居住在殖民地的土著印第安人和从非洲贩运来的黑人奴隶,都曾向殖民统治者发起过无数次的暴动和起义,前赴后继地进行过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土生白人也因受到宗主国和“半岛人”的歧视、排斥和限制,多次起来反抗。这些斗争虽然都程度不同地打击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势力,但都不属于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也不能称为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运动。上述三股力量尽管面临着共同的敌人,但是没有共同的奋斗目标,更谈不上有统一的革命纲领,而且在斗争中彼此也并没有联合行动。特别是由于种族偏见的影响、阶级利益的差异,上层土生白人因害怕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觉醒,威胁到自身的既得利益,因而在斗争中往往不愿意也不敢与印第安人和黑人联合,历次斗争总以失败

告终。所以，独立革命前的斗争绝大多数是分散的、自发的，土生白人的反抗也只是一种分立主义运动。

19世纪初的西属拉美独立运动和上述斗争有着传统的联系，但是，它是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新的高潮已经到来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发展的，因而这场运动不仅在斗争方式、阶级力量配备等方面有别于前期的斗争，尤其在革命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等等方面都必然赋予新的性质和特点。

18世纪在欧洲勃然兴起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不仅影响了北美独立战争，成为法国政治革命的先导，并波及于欧洲其他国家，而且它也冲破了西班牙、葡萄牙封建殖民统治者设置的重重障碍，从各种渠道迅速传到了拉丁美洲，给正在进行反殖、反封建斗争的拉美人民带来了新的思想武器，进一步促进了他们民族独立意识的觉醒，并给行将到来的大规模革命运动打上了深刻的资产阶级烙印。同时，美国、法国以及海地人民成功的革命实践和巨大成果，也给苦斗中的西属拉美人民以巨大的启示和鼓舞。

从18世纪中叶起，拉丁美洲与欧洲的联系日趋频繁，法国的启蒙思想相继传入了黑暗的美洲大陆。在墨西哥，有以X. B. 提阿斯·德·加马拉、达瓦洛斯(1745—1783)和巴尔托拉契(1739—1790)为首的哲学派别，传播启蒙主义者的思想。在智利，出现了以A. 格拉缪谢、A. 柏恩和X. 罗哈斯为首的共和主义秘密团体，“罗哈斯在1772—1777年间到过欧洲，并从那里带回智利一大批书，其中包括《百科全书》。”^②哥伦比亚人A. 那利诺(1765—1822)于1794年8月，将《人权宣言》译成西班牙文，并在波哥大印发，他曾因此被捕，坐了12年牢^③。有些土生白人知识分子把美国的《独立宣言》、潘恩的《常识》、《人权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及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人的著作，悄悄地带进殖民地，有的翻译成西班牙文，印成小册子，秘密地广为传播^④。一些吸取启蒙思想研讨殖民地独立问题的革命组织，也纷纷建立。到19世纪初，拉丁美洲许多人都知道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已成了拉美有识之士的共同理想^⑤。

原来不少上层土生白人虽然有分立主义倾向，但往往只限于反对西班牙王室和殖民当局的一些具体政策和措施。欧洲启蒙思想传入拉丁美洲之后，这种分立主义思想和劳苦大众的朴素反抗情绪逐渐发展成为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并在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立志为本民族、本地区独立解放而献身的战士。南美独立运动的先驱者米兰达、玻利瓦尔、圣马丁和墨西哥的伊达尔哥、莫雷洛斯等人，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者。

这些代表人物民族独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除了西属拉美殖民地社会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现实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都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受到美、法革命的巨大影响，都是启蒙思想的追随者和实践者。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从一开始，法国革命的思想启示，在拉丁美洲就获得了一批重要的追随者，并且有力地推动了导致各殖民地摆脱西班牙的独立战争的激荡局势。卢梭、孟德斯鸠、雷纳尔和伏尔泰的思想在拉丁美洲广泛传播，启发和引导了早期的拉丁美洲思想家。”^⑥

弗朗西斯科·米兰达(1750—1816)于1783—1784年间旅行美国，亲自感受到了刚刚获得独立的美国人民的喜悦之情，并结识了乔治·华盛顿和其他一些领导人。随后，他到法国参加革命战争。据1974年问世的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普(1830—1848年在位)的《回忆录》一书提供的材料证实，米兰达在法国革命军中的军事作用“表现得非常突出。”在1792年抗击普鲁士武装干涉的莫尔托姆战役中，他率领2,000人打败了三倍于己的普军；在法军进攻比利时的战役

中，米兰达在安特卫普战线起了显著的作用，后被国民自卫军总司令杜穆里埃任命为“北方军”的总司令，连出身、军衔都比他高的夏尔特尔公爵、中将（即路易·菲力普）都是米兰达的下级，不得不“随时准备接受他的命令”。^⑦

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在青少年时期，就受其家庭教师——一位卢梭思想的崇拜者——西蒙·罗德里格斯的良好教育。这位老师的进步思想，对于玻利瓦尔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的形成以深刻的启蒙作用^⑧。他16岁留学欧洲。1804年拿破仑加冕称帝时，他正在巴黎，这件事对他影响颇深。他说：“我承认，这件事使我想到了我国的奴隶制，想到了解放祖国的人可能赢得的光荣”^⑨。他在返国委内瑞拉途中，1805年8月15日，在意大利罗马城萨克罗山顶上当着老师罗德里格斯立下誓言：“我在您的面前宣誓，以我双亲的上帝的名义宣誓，以我父母的名义宣誓，以我的名誉向祖国宣誓：不打碎根据西班牙政权的意志压迫我们的枷锁，我誓不罢休！”^⑩1807年，他在回国领导独立战争的实践中，这种为祖国独立而献身的思想又有了发展。他清醒地认识到，要争取委内瑞拉独立，非砸碎西班牙在整个南美洲的殖民枷锁不可！因此，他全身心地投入了为解放全南美而斗争的正义事业，从而获得了“解放者”的美称。

何塞·德·圣马丁（1778—1850）虽是军人出身，并在西班牙军队中服役多年，但他从侨居欧洲的美洲进步人士中，了解到了许多美、法革命和拉美殖民地斗争的情况，从而激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同时，他精通法语，阅览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许多著作，坚定了他作为一个美洲人要为美洲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决心。他说：“1811年，我还在西班牙军队中服务。二十年正直的效劳，使我获得了一些地位，但我毕竟仍然是一个美洲人。我了解到祖国的革命。当我决定抛弃财产和希望时，我所想的仅仅是以自我牺牲来为祖国的自由作出贡献。1812年初，我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从此，我便献身于美洲的事业了。”^⑪

米格尔·伊达尔哥（1753—1811）14岁在圣·尼古拉斯神学院学习时，就阅读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毕业留下任教员并升任院长后，他便把该院变成了宣传法国自由主义思想的阵地。1773年后，他任米却肯州圣·费利佩镇神甫时，公开号召教民不分种族出身和贫富贵贱，都可以参加自由讨论国家大事的集会。1793年，他在一次群众集会上明确表示：“希望我们王国也享有这种（法国式的）自由”。他反对君主制，主张在美洲建立象法国那样的“共和政体”。他所主持的教区，有“小法兰西”之称。难怪后来宗教裁判所在把伊达尔哥驱逐出教会时，也宣判他是“卢梭的信徒”，“法国式的自由的主张者”^⑫。被宗教裁判所官吏称为英、法“罪恶思想”的追随者的何塞·马里亚·莫雷洛斯（1765—1815）更为激进。他在斗争中提出的要建立独立的墨西哥共和国、实现种族平等、废除教会和军队特权、将大地产分成小块分配给农民、实现普选等等主张，更是深深地打上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印记。伊达尔哥和莫雷洛斯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们不仅接受、传播了欧洲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而且还顺乎潮流把这些思想与墨西哥的实际相结合，在拉丁美洲独立革命中树立了把夺取土地与争取独立密切结合的典范。墨西哥历史学家X·艾尔南捷斯·卢那指出：“美国和法国的榜样并不是我们争取独立的运动的起因，但是这种榜样却伴随着我们的运动，加速了它的爆发，并在思想上团结着、推动着和鼓舞着它一直走向伊达尔哥在多罗雷斯的发动。”^⑬这种见解，我认为不仅对墨西哥，就是对整个西班牙美洲地区也是中肯的。

西属拉美殖民地的革命几乎同时发动，普遍展开，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19世纪初欧洲国际形势的变化使西班牙本身严重衰弱、危机四起，从而导致它对殖民地控制的削弱。

18世纪的欧洲，由于荷兰、英国、法国的崛起，西班牙、葡萄牙这两个封建殖民帝国已

降落到欧洲二等国的地位。但是，直到这一世纪末，西班牙在拉美殖民地的统治一般说来，尚能勉强维持。进入19世纪初，国际形势愈来愈不利于西班牙。国内人民受法国革命的影响，掀起了反封建斗争。1807年，西班牙被迫参加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后，因受到英国从海上的反控制、反封锁使它与拉美殖民地之间的交通联系几乎中断。特别是1808年法军攻占马德里，1810年西班牙本土大部分地区被拿破仑军队占领，连国王都成了阶下囚之后，它内外交困、不能自拔，对殖民地的统治更加力不从心。这一有利时机，正好促使拉美殖民地人民的革命烈火普遍地燃烧起来。

西属拉美人民经过近16年浴血战斗，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如果从世界全局来考察，它不仅沉重打击和彻底冲垮了西班牙的封建殖民主义体系，而且对欧洲、美洲的封建制度也是猛烈的冲击。这有利于世界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从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首先，这场声势浩大的独立战争是继16世纪尼德兰人民反西独立战争之后，给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以毁灭性的打击。此后，西班牙虽然还占有少量的、分散的殖民地，但是作为一个殖民帝国，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而它的瓦解，正是中世纪与近代之交的一个封建堡垒的彻底崩溃。这对于欧洲封建制度的总崩溃和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无疑是起了积极的作用。不仅如此，在拉丁美洲人民的打击、牵制下，西班牙国内的封建统治日渐衰弱，这也大大有利于西班牙本国人民起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1812年和1820年的西班牙两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不能说与西属拉美人民的独立战争没有关系。其次，这场独立战争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思想在拉丁美洲的胜利。15个共和国的建立，虽不意味着这一地区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彻底完成，但是挣脱了西班牙封建殖民枷锁而独立，毕竟为这些国家朝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同样对整个美洲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产生了直接的、深远的影响。第三，西属拉美人民革命的正义事业，使维也纳会议和神圣同盟的反动宗旨开始破产，加深了神圣同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从而加速了这一国际封建反动堡垒的瓦解。

综上所述，19世纪初西班牙美洲独立运动的兴起和结局，都是与这一时期欧洲启蒙思想的传播、重大资产阶级革命事件的影响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等背景有密切关系。如果不受美、法革命及海地革命的影响和支持，在拉丁美洲没有一批受启蒙思想熏陶、资产阶级民族独立意识很强的卓越领导人率领人民为之而艰苦奋斗，没有拿破仑战争所造成的西班牙宗主国严重衰弱，那么，这场独立革命要同时爆发并在同一时期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可见，西属拉美独立运动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不仅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而且本身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并且是这一时期世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

19世纪初西属拉美独立运动作为一次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由于本地区历史因素的制约和所处时代条件的不同，使它具有以往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不同的时代特征和自身的鲜明特点。进一步考察这些特征和特点，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场革命的性质与意义。

19世纪初的30年，整个欧美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主义制度激烈搏斗的时期。自18世纪末，英国和欧洲封建君主们武装干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紧接着拿破仑帝国的兴起与战争，使这两种势力的搏斗更趋尖锐、激烈。随着拿破仑帝国的覆亡，维也纳会议的召开和

神圣同盟的建立，在欧洲暂时出现了一个封建势力复辟的黑暗年代。西属拉美独立运动经历的16年(1810—1826)，正是拿破仑帝国由胜转衰、神圣同盟猖獗一时的年代。这两种势力搏击中的力量消长、变化以及同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都对西属拉美独立运动的进程和结局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神圣同盟的宗旨是用武力维护维也纳会议所确立的封建正统秩序和阻止、镇压新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西班牙是这一国际反动组织的重要成员国之一。西属美洲殖民地迅猛兴起的革命风暴，把西班牙封建殖民帝国冲得土崩瓦解，这自然是触犯了神圣同盟的反革命信条，引起了它刻骨的仇恨。所以，沙皇俄国和神圣同盟诸国曾多次策划武装干涉这场革命。西班牙也在竭力争取神圣同盟和英国为其镇压拉美独立运动出力。如：西班牙政府曾敦请俄、法、奥地利及英国在巴黎举行会议，商讨“帮助西班牙调整叛乱的殖民地的事情。”^⑭但是，由于神圣同盟内部矛盾重重和英国出于自身的殖民利益而表示坚决反对，^⑮加上1823年12月美国“门罗宣言”的发表。遏止了神圣同盟武装干涉拉丁美洲的野心，致使欧洲封建君主们的干涉计谋化为泡影。尽管“门罗宣言”包含有美国染指拉丁美洲的险恶用心，但是，在当时拉美人民革命的主要威胁来自西班牙和神圣同盟的条件下，正如威廉·福斯特所说：“发表门罗的著名宣言……对梅特涅和神圣同盟中的伙伴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对拉丁美洲各国也是有利的，因为它们处在虎视眈眈的列强中间，门罗主义多少给它们一种保护。”事实上，当时“门罗主义在拉丁美洲是普遍受人欢迎的，”尽管美国这一“片面的行动”“若干年来，给拉丁美洲带来了很多灾难。”^⑯

以上事实说明，西属拉美独立革命的确面临着神圣同盟武装干涉的危险，但是，由于当时欧美国际关系的变化影响、列强之间的勾心斗角，使它基本上是在没有外来武装干涉的情况下进行的。出现这种情况，当然原因不少，如：这场革命的前期(1810—1815)欧洲“反法同盟”诸国忙于拿破仑战争和争夺霸权，无力西顾；后期(1816—1826)神圣同盟想武装干涉也因上述情况未能得逞。但是，更深刻的原因在于这场革命正处在整个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主义制度激烈搏斗的时期。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说，这时资本主义制度战胜和取代封建主义制度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反动势力都无法阻挡的。西属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兴起、发展是这一历史潮流的产物，它的巨大胜利又反过来推动了这个潮流的前进。这就是它的鲜明时代特征。联系到同时期即19世纪20、30年代欧洲许多国家发生的资产阶级民族或民主革命运动对神圣同盟的冲击，就会进一步认识到：西属拉美独立运动是一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事件，是已为实践所证实的世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近代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虽然有一些共性的特征，但是也必然各自有一些个性的特点。西属拉美由于社会经济落后，民族压迫残酷，这场独立革命的特点，主要表现在革命的领导者、进程和结果上都有其特殊性。

19世纪西属拉美独立运动的领导者，是土生白人地主集团中的先进分子，并不是本地区的资产阶级。首先，当时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还处在形成过程中，力量弱小，不可能担负起领导阶级的重任。尽管到18世纪后半期，西班牙的贸易垄断政策不得不有所松弛，有些地区的某些工农业也取得了初步进展，但是这远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宗主国的限制和压抑，殖民地的经济仍然得不到自由发展。这种情况既造成了新兴商人、资本家、大农场主对宗主国的强烈不满，有革命的要求；又使这个“先天不足”的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去领导一场革命来改变它。这一痛苦状况，是由该地区的社会性质和经济历史条件造成的。其次，土生白人

地主集团力量强大，其中的先进分子有可能、有力量充当革命的领导者。据统计，1800年在整个拉丁美洲不足2,000万人口中，克列奥人约有300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土生白人^⑦。他们几代居住在殖民地，有较大的社会经济实力。其中的上、中层分子，即地主集团掌握着殖民地的部分土地和矿场，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市政议会的议员，有的担任行政、军队、法庭和教会中的中、下级职务，有些是律师、医生和教师。他们是殖民地的知识分子。这些土生白人中的上、中层分子，虽属于地主阶级，有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一面，但是他们是殖民地的地主阶级，与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地主阶级不同。他们组织生产活动的方向是朝着宗主国和国际市场的，他们一开始就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以供应殖民地内外市场的需求。然而，他们的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都无不受到宗主国和“半岛人”的限制、排斥和打击，因此，在独立战争中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并且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他们有进行革命的强烈要求和愿望。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有知识的先进分子，不少人曾到欧洲留学或生活，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感召，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和追随者。前面提及的米兰达、玻利瓦尔、圣马丁等人就是这些先进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实际上成了代表拉丁美洲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由于他们有文化、有胆识、有能力、有斗争经验、还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故而这场革命的领导权就落到了他们手中。这虽然有别于法、英、美等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但是，这也绝不是传统的封建地主阶级充当领导者。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拉丁美洲的代表者和实践者，他们领导的这场革命是完全符合拉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打上了资产阶级革命深深印记的。由土生白人地主集团中的先进分子充当领导者，这在当时的西属拉丁美洲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也自然具有反封建的不彻底性。这是此次独立运动重要的特点之一。

西班牙是在拉丁美洲占有土地和人口最多的殖民主义者，西属美洲殖民地的革命所经历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斗争也十分曲折和激烈。然而，它的进程也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即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区域性。它的两大阶段是以维也纳会议结束和神圣同盟建立的1815年来划分的。这一方面表明它深受国际反动势力和西班牙封建势力力量消长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场独立运动本身有一个从全面爆发——初步胜利——挫折失败到总结经验教训——普遍深入发展——全面夺取胜利的过程。这场革命是分墨西哥中美洲、南美北部和南美南部三大地区进行的。在斗争进程中，不仅每个区域内部的国家、种族之间形成了一个战斗集体，而且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各区域之间能互相呼应、配合和支援。整个西属南美殖民地的解放，就是这种配合与支援的光辉范例。之所以有这一特点，除了西属拉美人民有着共同的处境、共同的敌人外，主要是因为他们同处于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潮流之中，都受到当时国际形势的深刻影响，有着共同的革命要求和愿望。

西属拉美独立运动结果的特殊性更为明显。主要表现在：独立后各国的封建大地产制度没有根本触动、削弱，而且在许多国家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加强，社会经济停滞不前；政治上“考迪罗主义”盛行，政变频繁，政局不稳，统治者依赖甚至投靠外国，为英、美等新殖民主义者的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

有的同志把这种结果作为否定这场独立运动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主要理由，有的学者虽然认为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但也说其反殖、反封建两方面的任务“都远没有完成”。因此，怎样认识它的结果，也是关系到评价这场独立运动性质的重要问题之一。

西属拉美独立运动没有根本触动封建大地产制度，甚至独立后这种制度在许多国家的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和加强，这是历史事实。但是，不能据此就认为这场革命远没有完成反封

建的任务。本文前面已经提到的对西班牙、对欧洲的反封建历史作用不说,就从拉美本身的经济方面来看,这些独立国家用暴力手段剥夺了原有的西班牙王室、贵族、僧侣、官僚在拉美的封建地产和经济特权,解除了殖民统治时期的各种禁令和限制,废止了各种强制性的规章制度,取消了各种贸易垄断权,从而使商业资本摆脱了各种专横束缚,加速进入了世界市场^⑧。在农村也有一部分大庄园的生产经营方式不同于革命前的封建生产方式,而逐渐向资本主义方式的大农场过渡。原有的封建性的奴隶制度被废除,农民也部分地摆脱了封建性的徭役。这种经济上对原有封建殖民土地制度和商业垄断权的有效冲击,岂不是为资本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发展扫除了巨大障碍、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吗?我认为,说这次革命远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欠妥,只能说它完成得不彻底。这恰好是这场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重要特点之一。正因为它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是以推翻外来的封建殖民统治者为主要敌人、以建立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独立国家为主要目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因它的反封建任务完成得不彻底(或很不彻底)就否定它的资产阶级性质。何况“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历史任务”,“不是一次革命,一个革命‘浪潮’所能完成的,而是资产阶级社会变革的整个时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周期。”^⑨

从反对殖民主义的任务来看,这场革命用武装斗争推翻了西班牙300年来根深蒂固的殖民政权,永远结束了原有的封建殖民制度,这些新兴独立国家的人民迫使西班牙没有也不敢卷土重来。这岂不是完成反殖任务的辉煌成果吗?至于独立后,英、美等新殖民主义者乘机渗透、控制、入侵拉丁美洲地区,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拉美各国面临的新的敌人,是摆在拉美人民面前的新的革命任务。前一时期的任务是“驱虎”,后一时期的任务是“打狼”,尽管“后门进狼”与“前门驱虎”有一定的历史联系,但是也不好因为后一时期要“打狼”而否定前一时期的“驱虎”任务的完成。

就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而言,这场独立战争与19世纪尼德兰反西独立战争和18世纪北美独立战争相比,本质上是相同的,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都取得了胜利,对世界历史的进程都产生了重大的、全局性的积极影响。但是,由于本身历史和时代条件不尽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没有尼、美革命彻底,这一特点就造成了独立后的拉丁美洲社会,没有象荷兰、美国那样迅速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致使反封、反殖、反帝的斗争在这一地区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程。世界历史本身就是复杂、曲折、多样的,这种现象正生动地表明:广阔无垠的世界在奔腾向前的总的历史长河中,总是向人们显现出五光十色、百川归海的壮丽奇观!史学工作者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指导下,历史地、具体地、深入地研究各地区、各民族、各国的历史实际,力求客观地评判众多历史事件的性质及特点,而不能用一种固定的模式去套量,更不能以某一国历史事件的性质为标准来评判其他。我们在认识19世纪初西属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性质和特点时,自然也应遵循这一条原则。

注释:

① 目前国内史学界对此问题大致有三种观点:(1)是资产阶级革命;(2)是带有资产阶级革命特点(色彩或性质)的民族独立运动;(3)是一种不彻底的土生白人自立主义运动。参见《拉丁美洲丛刊》1982年第5期,第39—40页。

②⑬ (苏)M. C. 阿里彼罗维奇等:《论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的解放战争(1810—1826年)》原载苏联《历史问题》1956年第11期。译文载《史学译丛》1957年第3期,第35页,第36页。

③④⑤ 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61—163页。参见②。

⑥ (美)爱德华·J·威廉斯:《从发展角度看拉丁美洲的政治思潮》,商务印书馆1979月中文版,第7页。

⑦ 参见《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普回忆录中的弗朗西斯科·米兰达》(蒋庆福译),载《拉美史研究通讯》第十一、十二期合刊,第66—67页。

⑧ 玻利瓦尔在后来回忆他的老师时曾写道:“罗宾逊(罗德里格斯)是我的启蒙思想的老师”。转引自萨那文,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2期第31页。

⑨ 引文见(厄)阿·鲁玛索·冈萨雷斯:《西蒙·玻利瓦尔》,新华出版社1980年中文版,第47页。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编译:《玻利瓦尔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⑪ 转引自郭伟成:《南美“安第斯山的骑士”——圣马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⑫ (美)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人民出版社1956年中文版,第180页。

⑬ 王造时译:《美国外交政策史》(英文版),第270页。

⑭ 例如:1823年2月,英国首相坎宁在给内阁的备忘录中提到:如果法国协助西班牙去恢复其美洲殖民地的统治,英国将以自己的海军优势进行反干涉。参见⑭。

⑮ 引文均见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第336页。

⑯ 克列奥人一般就是指土生白人,即西班牙人夫妇在美洲所生的后裔。但这里统计的300万克列奥人中,还包括有极少数有地位和富裕的梅斯提索人、印第安的卡西克以及古“印加帝国”王室的后代。见③第159页。

⑰ 参见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上册,第197—199页。

⑱ 《列宁全集》第16卷,第197—198页。



(上接85页)

⑲ (苏)伊万诺夫主编:《战争初期》,第250页。

⑳ (英)国际事务概览:《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第1146页。

㉑㉒㉓ 国际事务概览:《希特勒的欧洲》,第300、408—409、409—410、410页。

㉔ (日)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第86页。

㉕ (美)伊利奥:《罗斯福见闻秘录》,上海新群出版社1949版,第103—104页。

㉖㉗ A·马努克扬、K·柯查列兹:《资本主义石油市场》,财政经济出版社1956年版,第15页。

㉘ (日)《兵器与技术》杂志,1981年8月号。

㉙㉚ (联邦德国)军事研究会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会战》,台北版,第189—190、298页。

㉛ 特雷弗—罗珀编:《希特勒的作战指令》(1939—1949),伦敦1964年版,第117页。

㉜ (英)《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周刊连载),英国帕内尔出版公司版,第39、1068页。

㉝ 《列宁选集》第4卷,第82页。

㉞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1页,第1卷第317页。